



海洋文藝叢書

國際作家風貌

何達著・海洋文藝社出版



國際作家風貌

何 達 著

目 錄

作家們的情誼

——《國際作家風貌》代序·····	1
訪西德作家漢斯·克里斯特夫·布赫·····	7
在聶華苓的家裏·····	18
美國詩人保羅·恩格爾的手·····	39
重逢日本小說家坂上弘·····	46
附：《日本今日的小說家》·····	53
訪問《從道釘到紡錘》的女導演·····	66
與英國影評人湯尼·雷恩的重逢·····	78
黑人作家奧比的友誼·····	93
南非作家托比的煩惱·····	102
意大利的朋友們·····	110
匈牙利作家奧圖的挑戰·····	120
巴黎一女畫家·····	131
差利·卓別靈的一生·····	139
「海鷗」的具體分析·····	160
學詩四十五年·····	174

作家們的情誼

——《國際作家風貌》代序

日記不在手頭，筆記也不在手頭，那一本厚達四分之三英寸，寫滿了各國各地朋友們題詞與簽名的紀念冊，也不在手頭。

然而這樣更好，這樣寫下來的，該都是難忘的事情。

其中最難忘的，是作家們的情誼。

最難忘的是那一次，陪聶華苓到愛荷華的郵局，去給一位伊朗的女詩人寄中國茶葉。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聶華苓說，“近來她的信，寫得越來越潦草了；一張紙歪歪斜斜地寫着幾行大字，有的字簡直看不清。我真替她耽心。……她最喜歡喝中國茶，所以我給她寄些中國茶葉去。”

伊朗女詩人，中國的茶葉，在這二者的中間，是聶華苓。

在當時，使我感動的，不只是那個伊朗女詩人所受到的留難與迫害，還有聶華苓在講述時的

輕輕發抖的聲音。

在這發抖的聲音中，震顫着的是作家與作家之間的無盡的相思與赤誠的關注。

聶華苓曾經在長途電話中，跟我談起黑人作家托比自南非打來的長途電話。

“我說：‘托比，快掛上吧，你知道長途電話要多少錢啊！’托比說：‘不要緊。你知道能夠聽到你和保羅的聲音，我是多麼高興。……我要你們知道我仍然健在，我仍然在幹着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在這次長途電話中，聶華苓的聲音，也在輕輕地發抖，在發抖中的聲音裏震顫着的是激動，是興奮，是一種永不會忘記的遠隔江山湖海的作家與作家之間的深情。

這次我跟聶華苓的長途電話，也打了很長，幾乎有半個小時吧。在電話中有很多事要講，有許多國際作家們的消息。作家們的情誼，是多麼使人難忘。

作家與作家之間，好像有無數的綫路相通。有時真像電訊那樣敏捷，千里萬里，甚至千年萬年，即使是片言片語，也能溝通那無盡的相思與赤誠的相許。

那一握手，那一點頭，具有多麼沉重的份量。

當你跟一個作家接近的時候，你好像接近一個世界。一個可以稱為作家的作家，他的心靈往往承担着千千萬萬人的哀樂，關懷着世世代代的禍福。在他的後面，往往就是幾十年的飽經憂患，在他的前方，往往還有幾十年的戰鬥與追求。

當你跟一個作家接近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一連串已經完成的工作，你也可以看到他的無比繁忙的心願。

他的一生，就如一系列無休無止的考驗，把他鍛練得日益成熟，日益完美。而他的行行，他的句句，曾經或者永遠在無數人的生命中開花結果，發熱發光。

難忘的是那一個個閃光的心靈，當說聲“再會”之後，就真有再會的打算，而且還真有永世的關懷。而有些作家，在短短的分別之後，真的就又重逢，即使是關山阻隔，即使要飄洋過海。

難忘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季在愛荷華，跟國際作家們的相聚。

難忘的是一九七七年春夏在歐美兩個大陸的旅程。

在這旅程中，經過了幾十個大小城市，參加了幾十個大小聚會，會見了許多舊友，結識了無數新交。

難忘的是，在回到香港之後，又和來自倫

敦、紐約、巴黎、東京等處的朋友們重逢。

這個集子中所記下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追憶。

爲了許多難忘的相知，曾寫了一首長詩：
《握手》，這裏且摘下一些詩行，向海內海外的
知交致敬。

我握着你的手
雖然輕輕
但你知道
我感情的重量

這並不是
珍重的告別
不是祝福
也不是許願

這是一個
約定
輕輕的一握
就約定了
你我的一萬年

我們看見的

是一萬年的美景
我們獻身的
是一萬年的事業

.....

我握着你的手
雖然輕輕
但你知道
我對你的忠誠

我的忠誠
承受得起
十萬年的信賴……
即使是十萬年的磨折
我仍然是一個
通體透明的原身

一萬年
爲着一件事情
流淚
流血
流汗
也流着
自劇烈的痛苦中

迸射出來的
火熱的
歡欣

……無論你在東半球
你在西半球
或者你在
另外一個星球
我們的每一個小時
都爲一萬年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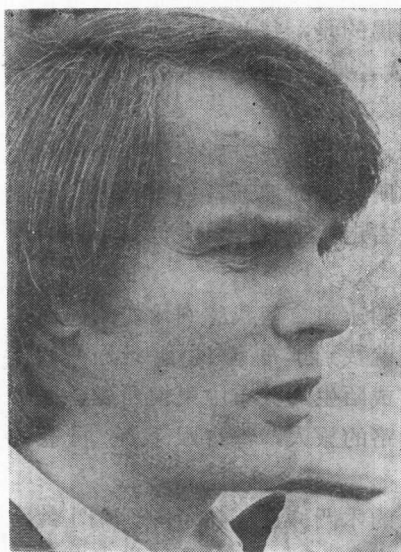
這大概只是原詩的三分之一。這裏說的“一萬年的事業”是什麼呢？可以說是最大多數人的最長遠的利益吧。

在許多事件、許多困難、許多動亂、許多驚險中，作家們的情誼，能够使我的內在熱得像一團火，堅得像一塊鋼。

一九七八、六、三，於香港。

訪西德作家

漢斯·克里斯特夫·布赫



布赫近照

西柏林的街道，很容易找。對我這個初次到來的陌生人，一點也沒有為難。

走到西柏林的街道上，隨時都可以知道自己身在哪一條街，哪一條巷，離要找的地址，大致還有多遠。

在每一條街口，都有一目了然的路名牌，豎在非常當眼的地方。不像巴黎，小小的路名牌，釘在建築物的牆角，有時還好像故意躲起來，不讓你看到。

特別值得讚揚的是，每個路名牌的底下，都附有門牌號數。或者是二——四，或者是四二——五三。

這個路名牌，很體貼地告訴你這一小段街道上面，是否有你所要找的地址。或者還要向左走，或者還要向右走，或者：“你所要找的地方，就在眼前了。”

這大概是一個永遠會使我感到愉快的回憶：我是那麼容易地就找到了布赫的地址。一個常常在陌生的地方或陌生的城市中東摸西碰、東查西問而且常常迷路的旅人，都會跟我有同感的吧。

在一個高大的木門旁邊，按了一下門鈴，出來的是一個小小的女孩。顯然她不懂得英語。當我重複地提到布赫的名字時，她就讓我進去了。

寬大的房間裏沒有燈光，沒有人，只有兩個

很小的小孩，一男一女。男的看來只有四、五歲。而女的比他更小。她，開了門讓我進去之後，就拋下我，回到滿地都是玩具的房間，繼續他們未完的遊戲。

我該怎麼辦呢？我走進他們的房間，用手勢來向他們要一支筆，一張紙；而他們似乎動了很多腦筋，那個大的才在一本小書上，撕了一張紙給我。

正在給布赫留字的時候，布赫就回來了。一個高大的人影，自黑暗的走廊裏撲了過來，把我的手用力抓住。

原來他這天上午，才自巴黎回來。回來之後，才看到我自倫敦寄來的通知。他趕到機場接我，而我已經離開了。

無論如何，我是應約而來了。

去年，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的晚上，在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城（Iowa City）的一個晚餐會中，會見了西德的年青的作家漢斯·克里斯特夫·布赫。

言談間，知道他是魯迅著作的翻譯者。而且，他譯的那本魯迅後期的雜文，在西德已經再版，銷數在一萬五千冊以上。

“這是一個大成功。”他說。

“這證明西德的讀者，也很需要魯迅。”他又

說。

“這使我更有信心地繼續翻譯魯迅作品的 工作。”他又說。

這些，對我這個魯迅先生的追隨者，都是令人振奮的好消息。

“你如果從歐洲回香港，就到西柏林找我吧。”

我多謝他的邀請，但並沒有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因為我不一定能夠從歐洲回香港，不一定會經過歐洲。

但在分手時，他又重申前意。而且還說：“我是很認真的。”

他認真地在我的筆記簿上，用一支綠色的筆，寫下了他在西柏林的地址。字很大，筆劃也很粗，好像要在這些字中，表示他的誠懇。

對於他，我究竟知道多少呢？

我知道，他一九六八年，正在愛荷華作客。可是他却參加了愛荷華大學美國學生的反越戰示威遊行。

我知道美國聯邦調查局，曾向愛荷華大學當局交涉，要把他送回西德，大學當局沒有答應。

我知道愛荷華大學的朋友們，都很喜歡他。他們說：“他也很喜歡我們。”

我知道，在西德，他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作家。

過了兩天，我決定了，爲了他，特別是爲了魯迅作品的翻譯，我一定要到西柏林一趟。

爲了要到西柏林，我一定要經過歐洲。

如今，我真地來到了。

當晚，他請我跟他的家人一起，在他住處附近的一條街上，吃中國菜。這家飯店，叫做“元朗酒家”。他一家四口，他的太太是一個醫生。

在那幾天，他每天都抽幾個小時陪我。

帶我去看柏林圍牆。

帶我登上木搭的高台，眺望圍牆那邊的世界。

帶我去看柏林的舊國會大廈，在這裏面正舉行着德國歷史的展覽。

帶我去西柏林作家自己開設的書店。

帶我去找幾個德國朋友。

帶我去看菲得烈大帝的王宮，王宮裏面的名畫，王宮後面的巨大的園林。

帶我去看河畔，指給我看他以前住過的地方。

帶我去找一個美國的女詩人，這個女詩人正遇上迫遷的難題。他對她說：“不要緊的，我在柏林認識的人很多，我會幫助你的。不要發愁。”

他也帶我去看他子女就讀的小學，帶我去西柏林最繁盛的街道，和一家最古老的飯館。

帶我去銀行。帶我去郵局。帶我去商店。幫我辦一些零碎的事情。

在他家，在飯館，在湖邊，在路上，他向我談許多事情。

他說，一九六八年，他們受到中國當時運動的影響，許多人離開家裏，搬到學校裏住，許多陌生人在一起，談各式各樣的問題。

他說，他們比巴黎的學生，行動得更早，在菲特烈的王宮的屋頂，扯起了紅艷的大旗。很多人的頭腦都改變了。

他說，他有一個好朋友，叫做路迪·德史克（Rudi Dutschke），號召力很強，說話很有道理。很多人都相信他，聽他的話，跟着他走。後來，極右派向他開槍，彈中腦部。他奇蹟似地生存了下來。子彈仍然留在腦部。

在醫院裏呆了六年，康復之後，他問我們：“這幾年你們做了些什麼？”

布赫又向我談德國的婦女，德國的兒童，德國年青的一代。

他談希特勒，談年青一代對希特勒的看法，他談西柏林的情況和它的特殊的地位。

他談他的作品，談他的文學事業，談他的創作計劃。

他給我看他翻譯的書，他的散文集，他編的

文學雜誌。

他編的《文學雜誌》很厚，是季刊，已出了四本，各有專題，各有重點。

第一本是“對於批評文字的批評”。

第二本是“哥德的研究”。

第三本是“文學的想像”。

第四本是“文學與文學死亡之後”。

問他什麼叫“文學死亡之後”。他說，在西德有一個時期，青年們認為文學是無用的，大家都不要文學了。

他正在寫一本有關加勒比海的書，書名可能是《加勒比海黑奴的革命》。

他說他不久以前，在海地住了幾個月。他小時候就在海地。他去海地好幾次。還有一些親屬還在海地。

他說那是一本紀錄性的書，可以搬上舞台。他說現在非洲很流行紀錄性的戲劇。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談魯迅。

他送我一本他譯的德文版的魯迅雜文。封面是白底黑字，四周圍着鮮紅色的細邊。上面印着魯迅的三幅照片。

這三幅照片其實就是一幅，曬印得深淺不同。

最淺的一張，看得清魯迅的親筆簽名和題

字：“魯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照於上海，時年五十”。

黑體字的德文書名印在魯迅照片的上面：
《雷峯塔的倒塌》。

爲什麼你採用這個標題做書名呢？我問。

“因爲雷峯塔這個形象有象徵的意義，它象徵着舊中國，和一切的舊傳統。”

你爲什麼要翻譯魯迅呢？

“因爲我認爲，像魯迅這樣一個世界性的偉大作家，而德國人都不知道。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是我們德國人的很大的損失。”

在你以前，就沒有人翻譯過魯迅麼？

“有是有的。但那是小說，不是他的雜文。在五十年代，東德、西德，都譯了魯迅的《吶喊》，就沒有人譯他的雜文。”

你確實知道沒有麼？

“確實的。”

魯迅這麼多雜文，你譯的是哪一部分呢？

“主要是他後期的雜文。”

你能講一講這個譯本中的內容麼？

“這裏面包括他怎樣寫《阿Q正傳》，文字與革命的關係，孔子在現代中國的地位，娜拉出走以後會怎樣，紀念劉和珍的文字，以及對於某些人物的批評等等。”